

DOI: 10.19361/j.er.2016.03.08

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民福祉的传导机制研究

李志平 周言覃*

摘要: 本文旨在揭示金融深化对农民福祉的传导机制,为农村金融深化政策取向从收入向福祉转型提供支持。基于程序化事实-理论分析-实证分析的研究路线,使用四川、河南、河北、湖北、云南五省的入户调查数据,借助结构分析模型,从物质产品消费、地位产品消费和公共产品消费方面设计三条相对独立的传导路径,探讨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民福祉的相互关系,并试图解释农村“收入-福祉”悖论背后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这三条路径中,公共产品消费路径对农民福祉的影响力度大于地位产品消费路径,而后者又大于收入或者物质产品消费路径。最后提出农村金融深化政策目标从收入向福祉进行调整及其相关风险防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金融深化政策;农民福祉;传导机制;结构方程;公共产品

一、引言

古今中外的大部分学者都认可,福祉是所有政策的起点、终极目标和效果评判标准。在新古典复兴之时,增长和发展的概念还没有被严格区分开来,收入增长和福祉提升被看做等价物。爱德华·S.肖(1988)及其追随者,大都是以收入增长为目标来论述和设计金融深化的理论框架和政策措施,即论证如何消除金融资源配置中的政策和制度干预,让市场通过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灵活调节,自主、独立决定金融资源走向,从而实现收入增长或者经济增长并促进社会福祉最大化。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这套金融深化政策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比如,Demetriades 和 Hussein(1996)发现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贾春新(2000)认为,我国金融深化政策,仅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引起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对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收入增长没有明显作用。当增长和发展的概念被区分开后,尤其是“收入-福祉悖论”(Easterlin, 1974)被提出来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金融深化和金融市场化政策对收入增长和福祉提升的影响途径并非总是单向线性关系,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福祉水平之间的传导途径和机制具有明显差异。世界银行(2013)认为,金融深化不仅具有增加收入等直接福祉,还具有增加权利、教育、预期寿命等非收入方面的间接福祉,不仅有助于促进短期福祉增加,还有助于促进长期福祉提高。Stiglitz(1998)、Hoff 和 Stiglitz(2004)论证,金融深化政策还可以部分降低市场失灵(比如金融供需

*李志平,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0,电子信箱:hebeili@mail.hzau.edu.cn;周言覃,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0,电子信箱:288940986@qq.com。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基于PSIA方法下的我国金融深化政策对农村全福利的影响研究”(项目号:2012RW007)资助。本文是在笔者提交给第九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的会议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感谢匿名审稿人与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社会福祉。还有研究认为,幸福和福祉对金融深化具有反作用,比如,对储蓄、资产选择、风险转移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习近平(2014)认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包括金融深化改革),将成为大概率事件或者常态(即“新常态”)。在新常态下,农村金融深化政策更需要从收入和增长目标升级到幸福和福祉目标进行顶层设计和谋划。

在区分收入增长目标和福祉提升政策目标的情况下,研究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民福祉的传导路径和机制,揭示主要路径和关键环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这不仅是因为农村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深化是否有效的试金石,而且通过农村金融深化的福祉瞄准性调整,还可以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提高农村金融风险的防控能力,降低社会各界对金融深化政策的质疑,并为农村金融深化政策的调整以及农村金融生态的完善提供新思路。目前已经有一些类似的研究成果。比如,熊鹏和王飞(2008)、袁怀宇和陈文俊(2011)等,但这些研究成果并未直接揭示两者的传导路径,而且这些成果多使用宏观数据和理性行为模型,对农民福祉的特征把握程度还不太高。鉴于此,本文拟用源自 Kaldor(1967)的程序化事实(styled facts)方法,从对农村金融深化政策传导中的一些特征的观察出发,基于程序化事实-理论分析-实证分析的研究路线,构筑分析框架进行研究。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程序化事实,第三部分是模型构建,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程序化事实

(一) 程序化事实一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现象还普遍存在。依据本文的调研数据和相关文献资料,农村金融抑制主要表现为:(1)农村资金缺口较大。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曾经有过贷款经历的户数仅占总户数的76%,但是在“如果条件容许的话,您在2013年需要贷款多少”的回答中,只有2.4%的人回答是不需要贷款。(2)农村资本大量外逃。57.4%的农民首选存款银行是含邮政储蓄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他们吸收的资金容易流出农村;与此同时,73.2%的贷款首选却是农村信用社。考虑到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比也逐渐走低,农村资本外逃的规模较大,不容忽视。(3)农村民间利率较高。由58.4%知道或熟悉农村高利贷的月利率的数据表明,民间高利贷活动还是非常普遍的。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农村的信贷配给现象比较严重,赵丙奇(2010)测算出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给比高达77.2%。

(二) 程序化事实二

农民的资本形成规模决定农民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水平。在农村金融抑制还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农村和农业的金融资源比较稀缺,农民增加资本投入,可以显著增加其总收入。在农业收入方面,根据本文调研数据,在柑橘、小麦、玉米等多个领域的资本投入产出弹性都显著大于0.5%。这与李明明和敬艳丽(2013)、马天祥(2014)等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在非农收入方面,诸如跑运输、做生意、从事建筑施工,车辆、工具等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增加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可知,农民掌握资本量的多寡可以决定其收入水平。

(三) 程序化事实三

农民福祉多元化趋势明显。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福祉水平不仅取决于绝对收入和消费水平等对应的直接福祉,还取决于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医疗、教育、交通通讯、社会治安等公共物品的供给所带来的间接福祉。根据本文的调研数据,农民的福祉与总收入、家庭相

对收入、农村社会治安、医疗保险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28、0.89、1.56、0.66,再根据“您最担心的问题”的回答,选择“收入少”的人数比例为 24.8%,选择“生病、上学难”的比例为 62.4%,选择“老无所依”的比例为 32.4%。这些数据都反映出农民福祉存在多元化倾向。

(四) 程序化事实四

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金融深化引致的正规制度变化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对农民福祉的影响力量大于传统规范、习俗。在农村,换工、换事、相互担保等形成多重锁定(interlink 或 coexistence)(Basu,1983;Chery et al.,2013)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这些多重锁定比较稳定,而由金融深化及其市场化改革所引致的农村制度变化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的变化较大,对农民福祉的影响力量也更强。再根据“您最担心的问题”的回答中可见一斑:85%的农民首选的是上学难(教育)、生病(医疗)、老无所依(社会保障),远高于没人关心(亲朋好友的负变量)、收入、物价、拖欠工资等。

(五) 程序化事实五

农民投资以内源投资为主,非农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在金融抑制和信贷配给较为普遍的情况下,农民投资以自我积累型的内源投资为主,因而农民个人储蓄和投资之间保持较为固定的比例关系。另外,本着节俭原则,农户一般不进行借钱消费,个人的绝对收入与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农村金融抑制降低农业投资总收益,增加非农业投资总收益(尤其是农村外收益)的比重。本文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户收入中非农收入占比较高,比如,湖北是 47%,四川是 45%、河北是 48%等。根据 2014 年《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2 年,我国农户的非农业收入占比分别为 49.6%、51.32%、53.98%、53.95%、54.63%、56.67%、57.62%、59.26%、61%,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三、理论分析

研究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民福祉的传导机制,首先需要明确农民福祉的内涵。在边际革命时期,杰文斯指出福祉就是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边沁认为福祉就是趋利避害和追求幸福。到了 20 世纪初期,庇古指出收入和财富只是影响福祉众多因素中的一种,但是可通过收入和消费来显示人们的福祉水平,收入增长或者经济增长与福祉变化具有相同的趋势。在“幸福—收入”悖论提出后的跨学科争论,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关于幸福与发展的大讨论,大大拓展了幸福和福祉的概念和内涵,比如将收入、消费等看做结果福祉,然后新增加“过程福祉”、“程序福祉”等等,再比如,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来代替国民收入指标等。本文根据 Frey(2001,2008)观点,“自陈的主观福祉”是一种更好的福祉测量。本文也坚持,农民福祉由农民说了算。下面,从传导途径的两侧(金融深化和农民福祉)来进行“夹逼”分析,进而构建理论分析框架。

在农民福祉一侧,有关农民福祉(*SWB*)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归纳为:(1)物质产品消费与绝对收入(F_1)。一部分学者认为绝对收入可以正向提高福祉水平(罗楚亮,2009),但也有有人认为绝对收入不一定正向提高福祉水平,出现收入与福祉悖论(Easterlin,1974)。(2)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F_2)。Ferrer-i-Carbonell(2005)、任海燕(2012)认为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对福祉水平影响更大。(3)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F_3)。(4)公共物品(F_4)。Ng(2008)、鲁元平和张克中(2010)、熊彩云等(2014)等都指出政府为居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比如医疗、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等)能够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陈刚和

李树(2013)的研究发现政府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对居民的幸福感都具有显著的影响。(5)社会资本(F_5)。李平和朱国军(2014)认为社会资本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6)制度因素(F_6)。Frey(2001)的研究发现,一个透明、宽松、分权的政治安排对于人们的幸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陈前恒和职嘉男(2014)研究认为直接民主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水平。(7)其他(F_7)。比如,年龄、性别等人口变量(李越、崔红志,2014),以及生活感知、生活信心等心理因素(熊彩云等,2014),都对福祉有影响。即:

$$SWB = F(F_1, F_2, F_3, F_4, F_5, F_6, F_7) \quad (1)$$

(1)式中: SWB 为农民福祉, F_i 为农民福祉的影响因素, $i=1,2,\dots,7$ 。

另外,在农村金融深化一侧,农村金融深化的社会经济效应的研究成果也较多,至少包括:(1)储蓄效应(S_1)(爱德华·S.肖,1988);(2)投资效应(S_2)(爱德华·S.肖,1988);(3)就业效应(S_3)(爱德华·S.肖,1988);(4)收入效应(S_4)(爱德华·S.肖,1988;贾春新,2000;King and Levine,1993;龙云飞等,2013);(5)影响相对收入或者内部收入不平等(S_5)(王小华等,2014);(6)促进物质产品消费的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S_6)(Maria and Geoffrey,2001;肖忠意、李思明,2015);(7)强化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S_7)(贾立等,2011);(8)其他效应(S_8)。即:

$$S_j = H(RFD), j=1,2,\dots,8 \quad (2)$$

(2)式中: RFD 表示金融深化政策, $S_j(j=1,2,3,\dots,8)$ 分别表示由金融深化引致的储蓄、投资、就业、收入、相对收入、消费、公共物品、其他效应。

由(1)和(2)式可以形成一系列彼此联系的方程组:

$$\begin{aligned} SWB &= F(F_1, F_2, F_3, F_4, F_5, F_6, F_7) \\ s.t. \quad F_i &= \Phi(S_1, S_2, S_3, \dots, S_8) \\ S_j &= H(RFD) \end{aligned} \quad (3)$$

(3)式中: $i=1,2,\dots,7; j=1,2,\dots,8$ 。

显然,金融深化 $RFD \rightarrow S_i \rightarrow F_j \rightarrow SWB$ 的影响路径中,共有 $p_7^1 + p_7^1 \times p_8^1 + \dots + p_7^7 \times p_8^8$ 种可能路径(p_7^7 全排列,其他类同),比如:金融深化 $RFD \rightarrow S_6$ (消费) $= F_3$ (消费) $\rightarrow SWB$,金融深化 $RFD \rightarrow S_2$ (投资效应) $\rightarrow F_1$ (农业收入) $\rightarrow SWB$ 。根据程序化事实,将金融深化 $RFD \rightarrow S_i \rightarrow F_j \rightarrow SWB$ 的影响路径进行简化,形成图1。比如,在农民福祉的影响因素方面,根据程序化事实四,将 F_4 、 F_5 和 F_6 合并为 FF_4 (公共产品消费变量); F_7 可纳入福祉测量之中;再根据程序化事实五,可以将 F_3 (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方面的信息使用绝对收入变量得以体现。这样农民福祉的影响因素缩减为3个(F_1, F_2, FF_4)。其他方面以此类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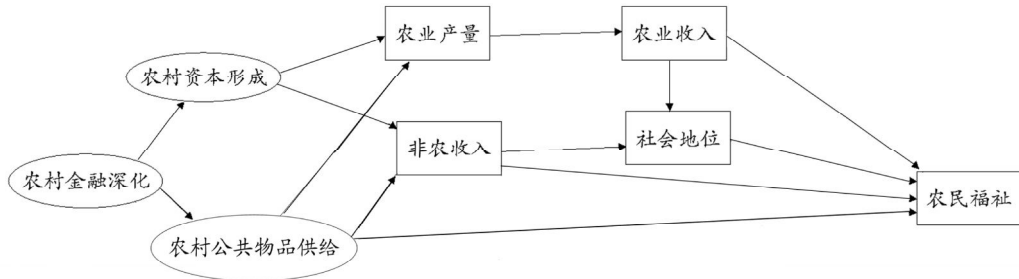


图1 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民福祉的影响路径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对我国各省份进行随机抽样,选出五个省份,分别是四川、河南、河北、云南、湖北。在正式调查之前,先进行了预调查。正式调查采用入户形式,共调研了 300 户,因为数据不全、数据明显有误等因素舍去 50 户数据,有效问卷是 250 份,其中,四川、河南、河北、云南、湖北的份数分别是 93、34、34、41、48,问卷的有效率 83.3%。调研时间为 2013 年和 2014 年。

(二)变量选择

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 1。

表 1 变量的定义和统计特征描述

变量	二级指标	符号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变量描述和定义
福祉	幸福水平	SWB	64	86	42	总体幸福感量表各项得分加总
金融深化	金融信贷数量	X_1	1.47	2	1	贷过款赋值为 2,未贷过款赋值为 1。
	贷款难易	X_2	1.33	2	1	农户难以获得贷款等金融服务的原因:没有熟人和贷款手续复杂设定为 1,无担保无抵押及其他设定为 2。
	竞争状态	X_3	1.46	2	1	高利贷的影响程度:熟悉高利贷利率取 1,其他取 2。
	贷款需求	X_4	1.62	2	1	贷款需求在 1 万元以上的取 2,在 1 万元以下取 1。
	资本外流	X_5	1.50	2	1	农户选择存款单位和贷款单位的前两位完全不同的取 1,至少有一个相同取 2。
资本形成	农业资本投入	S_{11}	1.62	10	0.125	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物质投入金额(单位:元/1 000)
	非农业资本投入	S_{12}	5.77	20	1	以住宅面积表示(单位:间)
农业产量	粮食产量	Y_1	3.14	10	0.25	单位:千斤
农业收入	农业收入	F_{11}	0.71	3.33	0.02	总收入-非农收入(单位:万元)
非农收入	非农收入	F_{12}	1.56	2	1	有非农收入赋值为 2,没有赋值为 1
社会地位	相对收入	F_2	3.16	5	1	数字 1-5 分别代表从“高水平”到“低水平”
公共物品供给	交通条件	S_{41}	2.96	5	1	数字 1-5 分别代表从“很不满意”到“非常满意”五个程度
	教学条件	S_{42}	3.08	5	1	数字 1-5 分别代表从“很不满意”到“非常满意”五个程度
	医疗设施	S_{43}	2.86	5	1	数字 1-5 分别代表从“很不满意”到“非常满意”五个程度

数据来源:根据本文调研数据整理。

一是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农村金融深化主要表现为:(1)金融规模的扩大;(2)金融工具的完善;(3)金融机构的优化;(4)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竞争);(5)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前三个方面可以用农户直接得到的金融信贷数量(X_1)来表示。金融机构增加网点、增加小额信贷等工具、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体现在农户获得贷款的数量增加上。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使用两个指标进行度量,一是贷款难易程度(农户难以获得贷款等金融服务的原因, X_2),二是竞争状态(高利贷的影响程度, X_3)。理由是,正规市场的运行越充分,利率调整的功能增强,高利贷现象减少,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困难程度就会下降。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用贷款需求(X_4)和农村资本外流的情况(X_5)两个指标来衡量。如果贷款需求比较高而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比较严重,反映出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较低。为了消除 X_1 、 X_2 、 X_3 、 X_4 、 X_5 的量纲问题,将这些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为 1 和 2 两个数值,

然后使用等距法进行权重赋值并加总,进而形成金融深化指标。

二是农民福祉指标(SWB)。使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对农民福祉进行度量。该量表由美国国立统计中心制定,共 33 项。本研究采用段建华(1996)修订版,即采用该量表的前 18 项评价总体幸福感。每个选项按 1-5 累积相加计分,得分越高,福祉水平越高。

三是农业产量指标(Y_1)。使用粮食产量(千斤)衡量。

四是农业收入指标(F_{11})。使用农户一年的农业收入衡量,单位为万元。

五是非农收入指标(F_{12})。使用“是否有非农收入”进行衡量。

六是社会地位指标(F_2)。使用农户自身对收入地位的评价进行衡量。

七是公共物品供给。使用农户对交通条件(S_{41})、教学条件(S_{42})、医疗设施(S_{43})的满意度进行衡量。

八是资本形成。用农业生产中化肥和农药的物质投入金额(S_{11})及农户的住宅(S_{12})进行赋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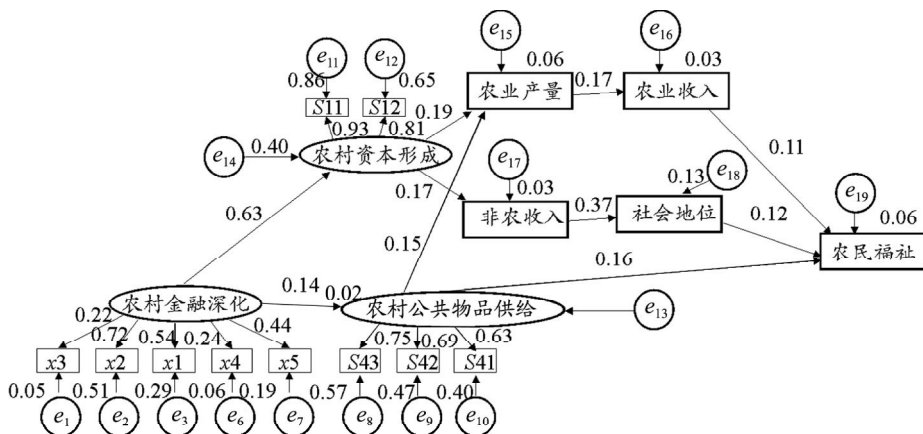
(三) 结构分析

根据图 1,使用 AMOS 软件,对本文数据进行结构分析,来揭示金融深化对农民福祉的影响路径,我们假定此模型为模型一。然后,在模型一中,除去不显著关系,形成模型二,再进行软件处理,处理后的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见表 2,路径系数路线图见图 2。模型二中的各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均达到 10%的显著性概率,绝对适配度指数、增值适配度指数、简约适配度指数都达到标准值,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另外,三条路径中的系数,也与第二部分的程序化事实基本相符。最后,本文还使用模型二,进行了分省模拟,结果与不分省的结果一致。因此,这里仅基于不分省份数据的模拟结果进行分析。

表 2 模型二的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检验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	临界比率	显著性概率
测量模型				
金融深化→ X_1	1	—	—	—
金融深化→ X_2	1.254	0.208	6.025	***
金融深化→ X_3	0.404	0.147	2.753	0.006
金融深化→ X_4	0.439	0.145	3.034	0.002
金融深化→ X_5	0.819	0.167	4.901	***
公共物品供给→ S_{41}	1	—	—	—
公共物品供给→ S_{42}	0.874	0.117	7.448	***
公共物品供给→ S_{43}	1.061	0.144	7.384	***
资本形成→ S_{11}	1.000			
资本形成→ S_{12}	1.720	0.168	10.238	***
结构模型				
金融深化→资本形成	3.529	0.699	5.799	***
资本形成→农业产量	0.246	0.087	2.814	0.005
农业产量→农业收入	0.195	0.071	2.759	0.006
农业收入→农民福祉	0.390	0.214	1.824	0.068
资本形成→非农收入	0.057	0.022	2.555	0.010
非农收入→社会地位	0.669	0.107	6.233	***
社会地位→农民福祉	1.053	0.526	2.000	0.045
金融深化→公共物品供给	0.284	0.187	1.99	0.05
公共物品供给→农民福祉	2.212	1.009	2.193	0.028
公共物品供给→农业产量	0.53	0.258	2.057	0.04

说明:(1)检验结果根据本文调研数据使用 AMOS 软件处理得到;(2)在显著性概率一列中,如果 $p < 0.001$,以符号“***”表示,如果 $p > 0.001$,直接呈现 p 值大小。



说明:(1)系数值根据本文调研数据使用 AMOS 软件处理得到;(2) e_i 为箭头所指变量的误差或者残差 ($i=1,2,\dots,19$)。

图 2 模型二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路线图

从图 2 可以看出,农村金融深化通过物质产品消费路径(农业收入路径)、地位产品消费路径和公共产品消费路径对农民福祉产生影响。

第一条路径,即农村金融深化→农村资本形成→农业产量→农业收入(农村物质产品消费)→农民福祉影响路径。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资本形成的路径系数为 0.63,农村资本形成对农业产量的路径系数为 0.19,农业产量对农业收入的路径系数为 0.17,农业收入对农民福祉的路径系数为 0.11。此路径中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民福祉的影响值 $=0.63\times0.19\times0.17\times0.11=0.002$ 。

第二条路径,即农村金融深化→农村资本形成→非农业收入→社会地位→农民福祉。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资本形成的路径系数为 0.63,农村资本形成对非农收入的路径系数为 0.17,非农收入对社会地位的路径系数为 0.37,社会地位对农民福祉的路径系数为 0.12。此路径中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民福祉的影响值 $=0.63\times0.17\times0.37\times0.12=0.005$ 。

第三条路径,即农村金融深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农民福祉。农村金融深化对公共物品的路径系数为 0.14,公共物品对农民福祉的路径系数为 0.16。此路径中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民福祉的影响值 $=0.14\times0.16=0.02$ 。

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新生路径,即农村金融深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农业产量→农业收入→农民福祉。在此路径中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民福祉的影响值 $=0.14\times0.15\times0.17\times0.11=0.0003$ 。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农村金融深化对资本形成的路径系数为 0.63,大于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路径系数。这说明现在的农村金融深化政策,主要是通过资本形成、影响农民收入,进而影响农民福祉水平的。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由此可知,当前以农民收入为目标的金融深化政策的总体效果尚可。但是,农村资本形成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为 0.17,对农业收入的影响为 $0.19\times0.17=0.03$,说明资本形成对非农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农业收入的影响。综合考虑金融深化对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可知,农村金融深化主要通过影响非农收入来提升农民的福祉水平。

再根据图 2,以农民福祉为目标和以收入增长为目标的政策效果,并不必然保持一致。比如,资本形成是农村金融深化的主要效应,但是其对农民福祉的间接影响较小(不管是通

过农业收入还是非农收入),而通过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民福祉的影响较大。由此可知,如果考虑公共物品的长期影响,金融领域的收入和福祉悖论可能会长期存在。原因可能有:一是力度。大病医疗和学生费用变化所带来的福祉增量,可能远大于收入所带来的边际福祉效用。二是叠加。农民福祉与绝对收入的关系,被其他路径叠加后,便不可能存在稳定的相互关系。农村金融深化可能会出现农民收入增长而感觉不到更高福祉水平的情况。

根据 0.02 (第三条路径) >0.005 (第二条路径) >0.002 (第一条路径) >0.0003 (新生路径),以农民福祉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村金融深化政策的调整,应该更多倾向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尤其是教育、医疗等,这将有利于提升农民的福祉水平。而且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农民福祉,还可以通过对农业产量的影响,进而影响农民福祉。此外,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如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可以创造一个稳定的生产经营环境,进而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五、研究结论

长期以来,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担忧发展中国家的“有增长无发展”、“有增长无福祉”现象的发生。在农村金融领域中也是如此。以市场为基础的农村金融深化政策体系,多年来都是以农民收入增长或者地区 GDP 增长为直接政策目标进行创新设计和运行的(King and Levine, 1993),但是政策效果不理想,农户福祉水平难以提升(Ferrer-i-Carbonell, 2005)。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金融深化对收入和福祉的传导途径和方式存在明显的区别:农村金融深化对收入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及其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渠道来推进的,而我国的农村金融深化政策对农民福祉的影响主渠道是公共产品消费渠道,然后才依次是地位产品消费渠道和物质产品消费渠道。

依据本文的结论,在新常态下,将农村金融政策的目标取向从收入和增长转型升级为农民的幸福和福祉,在着力点、政策渠道等多个方面都需要进行大范围地调整和完善:首先,相关的政策调整要尽量向农村养老、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公共物品倾斜,激活民间投融资、提高金融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的推动力量,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民福祉的推动作用。另外,依据地区特征和金融深化向农户福祉的传导路径的关键环节,设立金融创新工具,对政策进行微调,预防政策跑偏。最后,相关的风险控制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比如,通过建设合作担保、众筹、农村股权交易等手段,将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的关系显化,增加风险预警手段;在公共产品方面,优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并使用法律手段,杜绝各类“白条”,去杠杆化地方政府的债务,以降低相关风险水平。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S.肖,1988:《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73年版。
2. 陈刚、李树,2013:《管制、腐败与幸福——来自 CGSS(2006)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文汇》第4期,第37-58页。
3. 陈前恒、职嘉男,2014:《村庄直接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第59-70页。
4. 段建华,1996:《主观幸福感概述》,《心理学动态》第1期,第46-51页。
5. 贾春新,2000:《金融深化:理论与中国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第50-59页。
6. 贾立、石倩、黄馨,201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效应的分析》,《农业技术经济》第11期,第34-44页。
7. 李明明、敬艳丽,2013:《河南粮食产量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5期,

- 第 52-54 页。
- 8.李平、朱国军,2014:《社会资本、身份特征与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居民社会网络变迁的视角》,《经济评论》第 6 期,第 113-125 页。
 - 9.李越、崔红志,2014:《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 4 期,第 18-28 页。
 - 10.鲁元平、张克中,2010:《经济增长、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基于中国幸福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第 11 期,第 5-14 页。
 - 11.罗楚亮,2009:《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财经研究》第 11 期,第 79-91 页。
 - 12.龙云飞、陶睿、杨慧,2013:《四川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开发研究》第 2 期,第 125-128 页。
 - 13.马天祥,2014:《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研究》,东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4.任海燕,2012:《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幸福研究——以国外幸福经济学发展为参照》,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5.王小华、温涛、王定祥,2014:《县域农村金融抑制与农民收入内部不平等》,《经济科学》第 2 期,第 44-54 页。
 - 16.习近平,2014:《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人民日报(海外版)》11 月 10 日。
 - 17.熊鹏、王飞,2008:《中国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内生传导渠道研究——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实证比较》,《金融研究》,第 2 期,第 51-60 页。
 - 18.熊彩云、孟荣钊、史亚峰,2014:《我国农民幸福指数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 12 期,第 33-40 页。
 - 19.肖忠意、李思明,2015:《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金融效应的地区差异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第 2 期,第 56-63 页。
 - 20.袁怀宇、陈文俊,2011:《中国农村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作用渠道的实证研究》,《经济问题》第 11 期,第 101-103 页。
 - 21.赵丙奇,2010:《农户民间借贷信贷配给:来自 600 农户融资的实证考察》,《社会科学战线》第 4 期,第 65-71 页。
 - 22.Basu, K. 1983. "The Emergence of Isolation and Interlinkage in Rural Market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35(2): 262-280.
 - 23.Chery, L., Lihe Xu, Yan Yuan. 2013. "Interlinkage between Farmland Rental and Credit Markets in China." AAEA Annual Meeting, August. http://ageconsearch.umn.edu/bitstream/151290/2/Long_Xu_Yuan.pdf.
 - 24.Demetriades, P., and K. Hussein. 1996. "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Cause Economic Growth? Time-series Evidence from 16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1(2): 387-411.
 - 25.Easterlin, R.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Edited by Paul A. David and Melvin W. Reder, 89-12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26.Ferrer-i- Carbonell, A. 2005. "Income and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5-6): 997-1019.
 - 27.Frey, B.S. 2008. *Happiness: A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 28.Frey, B.S. 2001. *Inspiring Economics: Human Motivation in Political Economy*. Lypia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 29.Hoff, K., and J.E. Stiglitz. 2004. "After the Big Bang? Obstacles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Rule of Law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3): 753-763.
 - 30.Kaldor, N. 1967. *Strategic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31.King, R.G., and R. Levine. 1993.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8): 717-737.
 - 32.Maria, C.G., and W. Geoffrey. 2001.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The Case of United Kingdom Consumption."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3(2): 177-197.
 - 33.Ng, Y-K. 2008. "Happiness Studies: Ways to Improve Comparability and Some Public Implications." *The Economic Record* 84 (265): 253-266.
 - 34.Stiglitz, J.E. 1998. "The Role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Development." The Fourth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an Salvador, El Salvador, June. http://kleinteilige-loesungen.de/globalisierte_finanzenmaerkte/texte_abc/s/stiglitz_financial_system_in_development.pdf. (下转第 107 页)

The Analysis of Migrant Women's Multi-dimension Poverty: Based on the Study of 451 Housekeeping Workers in Beijing

Zhang Xiaoying¹, Feng Hexia² and Wang Xiaolin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3: Information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Leading Group Offi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Abstract: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is a major challenge faced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Migrant women, in particular, tend to suffer from poverty in various dimensions. This paper uses the FGT method (for income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the AF method (for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to calculate the income poverty,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I)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includ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MPI-II) of 451 migrant women Housekeeping workers in Beijing. The dimensions include income, education, health, living standard and social inclusion.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based on the national rural poverty standard, all the migrant women workers have shaken off poverty; The analysis of objective poverty with MPI-I indicates that migrant women are the most poverty-stricken in the living standard dimension; The analysis of subjective poverty and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difficulties with MPI-II indicates that migrant women are the most poverty-stricken in the social inclusion dimens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formula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trategies, we should redouble effort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ocial inclusion for migrant women and improve the social inclusiveness for migrant women.

Keywords: Housekeeping Service Industry, Migrant Wom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ocial Inclusion

JEL Classification: O15, J16

(责任编辑:陈永清)

(上接第94页)

35. World Bank. 2013. "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Finance." 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port, Washington, D. C.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PContentServer/WDSP/IB/2013/04/04/000158349_20130404091612/Rendered/PDF/wps6400.pdf.

Rural Financial Deepening and Farmers' Happiness: A Perspective of Transmission Mechanism

Li Zhiping and Zhou Yanqi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of rural financial deepening and farmers' happiness in the framework of style facts-theoretical analysis-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ructure analysis model and a sample of 250 farmer household survey data from Sichuan, Henan, Hebei, Hubei, Yunna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ral financial deepening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armers' income and well-being by three channels of absolute income, position product and public service, which is stronger than the other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rural financial deepening policy adjustment aiming at farmers' welfare.

Keywords: Financial Deepening Policy, Farmers' Happines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Public Service

JEL Classification: E6, O2

(责任编辑:彭爽)